

中国共产党建党经费来源探秘

B 中共建党经费 扑朔迷离的历史脉络

关于共产国际经济资助问题,其历史脉络扑朔迷离,极其复杂,有待商榷。

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,“《新青年》杂志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”。然而,资助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等依然迷雾重重。

文献显示,直至1920年底,苏俄对华工作仍严重缺乏经费。1920年9月30日,东方民族处曾允诺“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,带上珠宝去卖”。并在10月23日再次致电维经斯基称“钱已经寄出”。在随后的信函中亦询问维经斯基“是否已经收到我们责成优林带去的两千美元?”然而直到该年12月21日报告仍称“缺少经费,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……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(钻石),已拿到东方去出售,并答应给10万美元。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,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”。

到1921年1月21日,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信函中称,“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,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,工作出

现停滞。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,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,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,这才挽回了局面,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”。

可见,由于苏俄方面对华工作严重缺乏经费,承诺的经费(包括售卖钻石所得款项和10万美元)皆未能兑现。以至不得不举借贷款来维持出版工作。

综上所述,共产国际给予上海发起组的资助,主要是在印刷与开展宣传活动方面。然囿于经费匮乏,这种资助的规模、稳定性和持续性都是值得存疑的。到1920年10月底,苏俄最后一次汇款给上海的维经斯基,随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也因经济短缺相继离沪,自此经济资助隔绝,上海发起组(临时中央)亦不再接受俄方任何资助,完全依靠自筹经费(包括新青年社的盈利收入)。据李达回忆,“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。”可见,从1920年5月,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,直到同年10月底,苏俄最后一笔汇款为止,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。

C 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 一次大会以后,则由国际津贴

自主创业的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,通过写信联系、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,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,是名副其实的“临时中央”,“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”。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,他亲自负责武汉、广州、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。1920年6月,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,陈独秀与他交谈了马克思主义,8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,并定期提供资助。根据张国焘的说法,在一大召开前,“计算(全国)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”。而且,“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,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元,营业赢利计4000元,汉俊设法筹措一些,湖南等处,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。(广东不在内)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,募了一些捐款。一次大会以后,中央则由国际津贴”。

可见到1920年底,苏俄经费断绝后,此时共产党之主要经费为自筹,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。与此同时,上海的临时中央以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为财政依托,不仅通过各种创收手段自筹经费,而且还给予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经济资助,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。

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,建

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。1921年6月初,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、马林商谈后,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,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,宣告党的成立。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、李大钊商议以后,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,请各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(每位代表附寄路费100元,回去时又每人送50元)。按照包惠僧的回忆,路费是由马林,也就是共产国际提供的,“钱由马林拿出来,张国焘用”。

由此可知,中共建党经费来源的历史脉络纷繁复杂。首先,建党经费的源头起自苏俄,从1920年5月,苏俄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,主要由苏俄出资赞助中共建党,其间陈本人亦利用私人网络筹措了部分资金(如新青年社的原始股本中即有一半由此而来),然而,到同年10月底,经费短缺的苏俄方面最后一笔汇款为止,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。此后,从1920年底一直到1921年7月一大建党前夕,依靠着上海临时中央的自主创收,自筹经费,勉力维持、建构起全国性共产党网络的发展和壮大。最后,则由共产国际直接资助一大召开的差旅费用。

1921年7月,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——中国共产党。在中共建立过程中,苏俄金援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,中共建党经费的来源问题是怎样的?是否如有人所称“中共是卢布党”呢? ■据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



陈独秀

A 建党经费的源头: 共产国际资助陈独秀上海建党

在中共建党进程中,《新青年》杂志上海编辑部起到了主导作用。1915年9月15日,陈独秀主编的《青年杂志》月刊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;从1916年9月1日2卷1号起该刊又改名为《新青年》。这份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。

1920年4月,经共产国际同意,由俄共(布)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(海参崴)分局所派遣的维经斯基一行5人来到中国,同中国进步人士建立联系,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。

1920年2月中旬,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,只身赴上海,“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”。来到上海后,陈独秀着手重组《新青年》杂志。他以陈望道、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,组成编辑《新青年》的上海同人团体。北京同人此时聘陈独秀在上海专任《新青年》编辑,并每月从编辑部用度中划拨编辑费100元作为陈氏的收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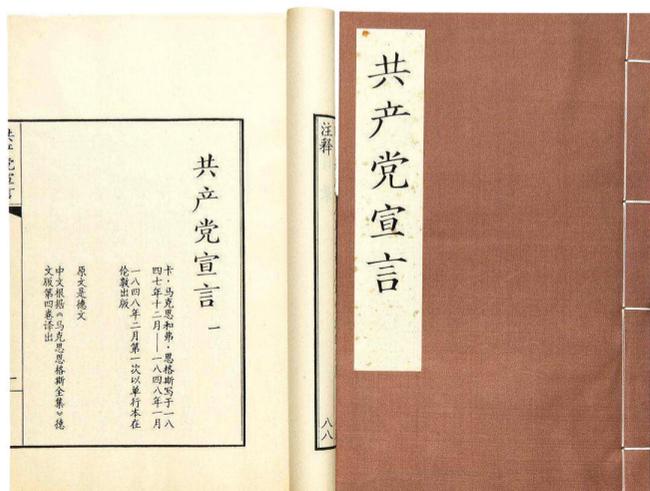
1920年5月,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,赴上海会见陈独秀。通过这番接触,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,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,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。随后,经陈独秀的介绍,维经斯基和戴季陶、李汉俊、张东荪等一起座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。与会者认为可将《新青年》、《星期评论》、《时事新报》结合起来,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。而维经斯基的到来,给予了建党大业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经济支持,使之成为现实。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,在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,包括“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,由5人组成(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),下设三个部,即出版部、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。”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,可以印刷小册子。

在陈独秀的领导与策划下,1920年6月中旬,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,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。

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,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。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,上海发起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宣传工作。首先便是通过《星期评论》杂志社,由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是年8月,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。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。



《新青年杂志》



《共产党宣言》(资料图片)